


书名、作者、ISBN

我读 动态 豆瓣猜 分类浏览 购书单 电子图书 豆瓣书店 2023年度榜单 2023年度报告 购物车(0)

# 《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摘录

 朱俊帆 评论 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2024-01-24 05:52:04 已编辑 美国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挪威

“这些挪威人，对自己今天的命运似乎非常满意。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方，人们对挪威的宪法日颇不以为然。杰出的瑞典民族学家阿克·道恩曾经形容挪威的5月17日是“全民谰妄”。如果你和丹麦人或者瑞典人说起挪威宪法日，他们会翻翻眼珠子，呵呵地笑起来，就好像在说，“挪威人和我们不一样。非常民族主义。非常沉迷于过去。不过，他们有那么多石油，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些人甚至直言不讳地把这番话说了出来，然后又补充说，挪威人反动，狭隘，动辄挥舞国旗，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分子（这是丹麦人对挪威人的评价；而我们已经看到，丹麦人在家里给猫过生日，也会把国旗插在猫的食物盘上）。”

“首先，穿上一条灯笼裤，披上一块巨大的象牙色斗篷，就像一个来自中土世界的逃亡者，大步行走在21世纪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街头，这需要相当的厚脸皮。它还反映了部族的一种令人嫉妒的自信，反映了与过去的纽带。自从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我们大部分人就较为质朴、纯真的过去抛在身后，急不可待地拥抱工业文明，到砖瓦和烟囱之间追寻生活了。在英国，传统民俗硕果仅存的遗迹成了偷懒的喜剧表演者动辄讽刺挖苦的靶子，还有像托马斯·比彻姆爵士那样的指挥家也对民俗冷嘲热讽，他曾经说过，“人活一世，一切都要尝试，除了乱伦和土风舞”。挪威的5月17日庆典也许无非是19世纪末形成的民族认同在战后的复苏，也许是对从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传统的浪漫想象；不过，毫无疑问，它的参与者的态度是真诚的。”

“这一天，我站在宽阔而干净的奥斯陆街头，油然而生一种压倒一切的强烈感觉，这个国家坦然自适，心安理得，人们不仅享受着丰富的物质财富，还具有同样宝贵的国民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深深地根植于共同的历史：如果你愿意，可以说，这是一种坚实的国民精神资本。挪威人穿着昂贵、累赘、在有些人看来俗不可耐的家乡装束走出来，他们向彼此发出信号：“我和你一样。我们有共同的历史、相同的价值观，我宁愿花大把的金钱，经过繁琐的缝纫工序，冒着受到当众羞辱的风险，也要表达这一点。这一天，我羡慕挪威。我羡慕它的和睦团结，羡慕它旁若无人的自豪感。是的，我也羡慕那些斗篷。世界上应当多一些可以披斗篷的场合。我披着斗篷想必也风度翩翩。”

“这一天在奥斯陆，人们没有去裸泳，而是敞开肚子尽情畅饮。这就是传说中的helgefylla（挪威人对豪饮的说法）。在阿克码头，独立日的狂欢者和高中毕业生们尽情地唱啊，跳啊，纵情豪饮，肆意欢闹。阿克码头是重新开发的港口区，附近闪光锃亮的写字楼鳞次栉比，这里也是全市豪华酒吧和昂贵的房地产项目的集中地。港口旁边，坐落着挪威宏伟炫目的新歌剧院，它像一块碎冰漂浮在不远处。午饭前后，热烈的畅饮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挪威的半数人口好像都在这一天涌到了奥斯陆，带着尽情玩乐一番的明确意图。到了午夜前后，满大街都是空香槟酒瓶。弗洛格奈维恩大街的窗沿上架着扩音器，里面播放着欧视大赛的获奖歌曲《我爱神话故事》；下面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人头攒动，喧闹非凡；客人们喧哗着涌出来，走在深夜的灯光之下。女人们穿着长及脚踝、饰有刺绣的厚裙子，与披着斗篷的男子跳舞；高中生穿着红裤子与其他头戴红色水手帽的高中生跳舞。在挪威，这一天是快乐的日子。”

“人一旦被剥去喜欢自己的错觉，纯真就结束了。”

——琼·狄迪恩（Joan Didion）

已经到了隆冬季节，阳光却依然耀眼，照在雪地上，把四周的风景变成了一片白花花的亮光，我不得不眯起眼睛。空气很清新。我从机场航站楼走出来，闻到了松针的清香。”

“奥斯陆物价很高，很多东西我只能望洋兴叹。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近期对全球200座富裕城市的一项研究，挪威居民为全球第二富有（仅次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他们的平均年收入达到74057美元。他们必须赚到这么多钱。这是我去过的唯一一座城市，它的公交车司机因为车票太贵向乘客表示歉意。“对不起，这里是挪威。”一位有轨电车司机对我说，他的脸上表现出由衷的同情。我只要搭乘短短一段距离，听到他跟我要50克朗（5英镑），我显然吃了一惊。”



豆瓣豆品 | 2024年龙年福气年包来啦  
豆瓣豆品

广告

> 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



作者: [英] 迈克尔·布斯  
出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 58.00元  
装帧: 平装  
页数: 394  
时间: 2016-1

> [侵权投诉通道](#)

“奥斯陆是北欧各国最无趣的一座首都。它不能媲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活力和多样性；不能叫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秀丽风光和宏伟建筑；也比不上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那种处于边缘的“他者”的刺激性，还有它那残存的冷战气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家门口就有火山和冰川，真不公平。奥斯陆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其他国家的二线城市，当然，多少个世纪以来，它确实是他国的二线城市。”

“说起他们对friluftsliv，也就是“户外生活”的热爱。瑞典人也许会说（假如瑞典人能言善辩的话），挪威人与大自然似乎有着极其强大的纽带；挪威的自然风光是挪威人狂热爱国情怀的源头。”

“在挪威，随心所欲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这是为了保持北方人口规模的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靠近战略要地巴伦支海和斯匹茨卑尔根的人口规模。”

“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挪威则不然：渔业（始终很发达，它如今当然也包括规模宏大的三文鱼工业养殖场）和石油业帮助它有效地抗拒了这股世界潮流。石油业的基地在西海岸，以斯塔万格为中心。凭借石油业创造的财富，现如今，挪威人即使生活在远离首都的地方也舒适惬意，有像样的基础设施、文化体育设施，以及高大雄伟的公共建筑，就像我在只有约500人口的村庄奥派德（Oppeid）看到的“克努特·汉姆生中心”。那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当代概念建筑：一座黑塔拔地而起，有机玻璃的阳台向外伸出。私人向导告诉我，它的设计是为了表现汉姆生的名作《饥饿》的某些内涵。兴建这座建筑物，花了相当于800万英镑的公共资金。把这座博物馆放在任何一座现代的首都城市，都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可是，这里每年只接待2万多游客，仅仅因为它远在北极圈内，距离任何一地都遥遥万里。”

“挪威人星期一早上彼此寒暄，说自己上周末去滑了雪、登了山，这些活动非常重要，”他说，“挪威人迷恋林间小屋和海上小屋，迷恋大自然。”史勒格斯泰德还指出，数量惊人的挪威姓氏与山川河流有关。“我们的姓名常常得自自然界某处具体的地方，曾几何时，人们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先辈曾经生活在哪里，那些地方是具体的、真实存在的地方，”他说，“我的名字的意思是河流拐弯的地方，当年我父亲的农场就在那块河湾处。所以，我们有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大自然有牢固的纽带。如果在城市生活，这种认同和纽带只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牢固。”

“挪威人与自然风光的牢固纽带有一个体现，那就是近几年播出过两档极其乏味无聊的电视节目，却取得了非同小可的成功。第一档节目是追随一列火车，从奥斯陆出发，一路翻山越岭，抵达卑尔根；节目的制作非常简单，只是把一台固定摄像机安装在火车头上，实时追踪7小时的行程。穿越隧道的时刻想必格外扣人心弦。这档节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视率，全国广播电视公司NRK受到鼓舞，再接再厉，又把一台摄像机安装在“北挪威号”上。“北挪威号”是挪威海达路德公司的一艘“特快”邮轮，它从南部的卑尔根一路驶向北部俄罗斯边境的希克内斯，电视台实况转播了为期6天的航程，全程无中断。虽然NRK打出的广告语之直白令人耳目一新，只称“敬请收看平实干巴的电视实况转播”，这档节目却演变成了一种万人空巷的收视和文化现象，吸引了全国半数人口收看：人们发起收看海达路德邮轮景观的聚会；在那艘邮轮沿着海岸向前行驶途中，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家门，点燃篝火，从岸边向它招手；还有人驾起小船，摇摇摆摆地跟着那艘满载欢声笑语的邮轮后面，驶出老远的距离。这档海达路德邮轮的观景节目还被上传到网上，吸引了20万丹麦人点击观看（挪威媒体喜滋滋地把丹麦人的收视叫作“高山仰止”），世界其他地方的观众也不少。后来，它成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档挪威电视节目。不过是风景罢了……”

“坐在匀速行驶的船上，挪威的风光正在从我眼前掠过。它的湖光山色如此明丽清澈，在北极透亮的光线之下，我能看得到白雪覆盖的山巅每一处隘口，看得清花岗岩的每一块断面。窗外的风景历历在目，纤毫毕现，就像以最高的清晰度传输到我眼前；我实在词穷，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眼前的景致。座座山巅宛若鲨鱼的下颌被放大了千倍。

我正乘坐海达路德邮轮，从博德（Bodø）驶往诺德斯科特（Nordskott）。诺德斯科特是一座极小的渔村，只有一道防波堤和几所木屋罢了，位于北极圈内。

挪威的峡湾美得惊人，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难怪《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的人物斯拉提巴法斯特（地球的建造者之一）因为设计了挪威的峡湾而获得奖品。事后想来，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正是奇美风光的魅力，正是挪威国民对这风光溢于言表的热爱，让我彻底丢开顾虑，放下羁绊——哪怕是隆冬的二月，哪怕到处银装素裹，冰天雪地，哪怕远赴北极——说服自己穿上干式潜水服，下到水底去寻找海胆。我有个朋友叫罗迪，是个苏格兰人，他和自己的挪威妻子在此地生儿育女。当地人管海胆叫“乌鸦卵”，罗迪潜水摸找海胆，再把它们卖给本地的高级餐厅。这里的海胆品质极好，只是水里太他妈冷了。我没戴手套，两只手在水里像烧灼一样生疼。”

“不过，诺德斯科特的风光足以涤荡心灵，使人忘情。每天早上，我吱吱嘎嘎地踩着积雪走向渔船，总要停住脚步，伫立片刻，抬头凝望眼前的波光山色。除了我自己的耳鸣，天地间一片静谧。我心中一念不生，肃然静默。奥斯陆的尘嚣，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代挪威的成功——福利国家制度，几乎无可比拟的生活水平，强大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和服务，以及散布各地、造价高昂、在建筑风格上推陈出新的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石油的基础之上。

这个国家只有500万人口，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挪威人并非生来养尊处优。挪威一向受到欺凌，它是斯堪的纳维亚三巨头的穷亲戚，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它是闭塞的农村，它的人口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勉强维持生计——挪威只有2.8%的土地是可耕地——以及在危机四伏的海洋讨生活，人们经常要对抗气候和地形造成的难以抗拒的危险。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天，来了个叫杰德的人[1]：轰！汩汩汩！石油喷涌而出。

挪威人从身穿紧腰宽裙的农民，摇身一变而为身穿紧腰宽裙的洛克菲勒。”

“有个故事尤其让许多丹麦人喜笑颜开，它讲的是几个瑞典人在挪威的一家加工厂工作，据报道，瑞典人是被雇来剥香蕉皮的。这是真事！我核实了一下：香蕉被用来制作一款流行的挪威三明治酱汁。这个笑话把懒惰的挪威人和受剥削的瑞典人一网打尽——丹麦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虽然年年都有人发出警告，挪威很快就会达到最高产油量，到那时，挪威人会发现自己一路下滑，退回到晒鱼干、剪羊毛的黑暗年代，可是，他们却接连不断地发现新的巨大的石油储备：2011年，在巴伦支海又发现了两块巨大的油田，储油量多达10亿桶；如今，冰盖可以轻松地融化（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在挪威人那滴滴溜的小眼睛的视线范围内，估计还有900亿桶原油埋在北极的地下。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他们度过漫长而黑暗的冬天，那么还有，挪威现在也是全世界第五大天然气生产国；再过几年，天然气预计会达到挪威石油产量的一半以上。”

“自从1969年发现石油以后，挪威迅速蹿升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实际上是全世界——财富排行榜的前列。今天，它是地球北部的迪拜，是披着斗篷的克罗伊斯王（Croesus，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目前，这个国家是继卢森堡之后人均GDP第二高的国家，而卢森堡几乎不能算作一个正式的国家。”

“这笔基金目前拥有8000多家企业的股权；这意味着挪威人拥有全球超过1%的上市公司，欧洲近2%的上市公司和亚洲0.7%的上市公司。”

“挪威人如何做到了抵制诱惑，没有把石油收入花掉？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就没能抵制这种诱惑，目前，某些阿拉伯国家也正在引人注目地把挥霍石油财富。

“有两个原因：首先，这笔基金的创始人清楚地说明，要避免荷兰病[1]。我们的经济很容易被毁掉；我们必须拥有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有能力在石油枯竭的情况下存活。如果失去了在全世界参与竞争的实力，一旦石油枯竭，就不能保证重新获得这种实力。

“传统上我们一直是个穷国，养成了节俭的消费习惯。人们生活在沿海，”他接着说，“挪威其实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没有过欧洲的封建制度，人们分散生活，而不是聚居在城镇和乡村。挪威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对文化无所谓。这种心态与一般国民不太一样，对吧？”

“我们看到，这是挪威人的一个根本特点，也是挪威人与瑞典人和丹麦人不同的地方。挪威人习惯了靠简单的必需品维持生活。正如史勒格斯泰德所说，“在这个国家，过去，除非预先节约和储藏，否则冬天没有足够的食物。”挪威人不喜欢放纵挥霍，对储蓄和积攒始终绷着一根弦。”

“纽约时报》采访了奥斯陆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克努特·安东·莫克。莫克说，“这是个石油换闲暇的项目……我们变得自我满足。度假屋接连不断地建起来。我们比多数国家的假期都长，还有极其优渥的福利和病假规定。这场美梦早晚要醒来。”

“挪威人到世界各地探险，体现出巨大的勇气和聪明才智——挪威有到南极和北极探险的罗尔德·阿蒙森和弗里乔夫·南森，有到南太平洋探险的人类学家托尔·海尔达尔——即使是这些值得庆祝的事件，他们也好像精心策划，把探险的目的地选在人烟稀少，乃至荒无人烟的地方。

“挪威人认定，他们既不喜欢，也不需要现代世界，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乡服饰、土风舞和鱼干，他们退回到了过去农业社会的安全地带，寄情于大自然和海洋。这时候石油出现了，石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但也只是帮助挪威人维持了传统的人口地理分布，保持了他们的隔绝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高枕无忧的小憩、和平、安定和从容，这种感觉当然是北欧人所享有的安全感和生活质量的根本，延伸开来，也是他们幸福感的根本。可是，安全、务实、共识、调和、社会凝聚力——这些不是生活的一切，只是需求层次中的基本需求罢了。我不可能是第一个指出它的缺陷的人：斯堪的纳维亚也许缺了点什么，缺了那些你也许希望在需求层次的更高级别找到的东西——激情、火焰、张狂和生之欢乐，如果你再往南去，也许会找到这些东西。在斯堪的纳维亚，哪里可以找到激情、胆魄、冲突、冒险，找到一种活在边缘、逼近极限的感觉？

我告诉你在哪里……我们的下一站：芬兰。”

丹麦

“傍晚时分，浓重的雨云终于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抹湛蓝的天光。我们像怯生生的受到救护的动物，大胆地走出户外，站在天幕之下，呼吸着清凉潮润的空气，转而沐浴在日落前最后的温煦之中。天边泛起粉红色的霞光。夜幕降临，粉红色的霞光渐渐变成魔法般的、仲夏季节的白光。终于，墨蓝色的夜幕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宛若气象仪一般，漫天繁星闪烁其间。

仲夏节是斯堪的纳维亚日历上的一个亮点，它最早是异教徒的节日，后来被教会据为己有，并重新命名，用来纪念“Sankt Hans”（圣约翰）。在瑞典，人们头戴花冠，围着五月花柱载歌载舞；在芬兰和挪威，人们欢聚一堂，燃起篝火。我旅居丹麦，我们的仲夏节就在我朋友位于哥本哈根北部的消夏别墅的花园里庆祝，大家开怀畅饮啤酒和鸡尾酒。10点钟，我们围在篝火旁，唱起了“Vi Elsker Vort Land”（“吾爱吾邦”）和其他一些打动人心的民族颂歌。

“多数人下午四五点钟就下班了，几乎没有人承受不得不在周末加班的压力；到了星期五，更是过了下午一点钟，就可以把工作抛在脑后。年假经常长达6周，7月份，整个国家关门歇业，丹麦人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出行了，就像生性温顺的野羚羊，纷纷前往距离自己的住处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消夏别墅、房车公园或者露营地。”

“瑞典人早早就成群结队地来到他们南边的这个邻国，这天晚上我就能看见厄勒海峡（Øresund strait）对岸的瑞典那明灭的灯光，他们抛开顾忌，无拘无束地体验一把他们眼中丹麦人那离经叛道、喜欢享乐的生活方式。（丹麦的年轻人则去柏林寻欢作乐。）”

“如果说这接二连三的失败和领土丧失没有对丹麦人造成持久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要再深入一步。我怀疑，屈辱的历史比任何其他因素——比地理条件、比路德宗的教义或者维京人的文化遗产，甚至比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福利国家，在更大程度上造就了丹麦人的国民性格。明白了吗？正是挫败和失落，曲曲折折地造就了丹麦人。

一落千丈的境遇使丹麦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使之成了一个比其他北欧国家更具凝聚力的部落。”

“国民心理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在这里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把问题作了简化，但是，这种眼界缩小、自我封闭的冲动和随之而来的民族浪漫主义却是丹麦人的一个首要特点，一句丹麦人至今耳熟能详的格言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Hvad udad tabes, skal indad vindes.

（失于外者，得于内。）

这句话是作家H. P.豪斯特（H. P. Holst）1811年写下的。

“豪斯特的这句名言也概括了此后丹麦文化史上伟大的“黄金时代”的真髓，那是19世纪中叶，社会流动性增强，艺术活动蓬勃发展，一名洗衣妇的儿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他成了丹麦最早一批真正的国际知名人士；索伦·克尔凯郭尔写出了划时代的存在主义著作；伟大的古典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画家C. W.埃克斯伯格（C. W. Eckersberg）及他的学生克里森·考克（Christen Købke）、皇家芭蕾舞团的大师奥古斯特·布农维尔等，他们共同努力，使当时的丹麦兴起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的高潮。丹麦人对这些真正世界级艺术家的作品趋之若鹜，几乎把它们视为那个遭受了惨痛损失的时代全部的安慰。他们在学习做他们至今仍然最为擅长的事情：感恩并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珍惜全社会的简单快乐；歌颂自己的丹麦属性；最重要的是，避免惹恼德国人。

“在别的国家，建立社会民主的坚实基础是进步、工业、现代性，可是在丹麦，它的基础是koloni have（那些温暖舒适的认租区）。

换句话说，在瑞典人努力推进伟大的现代而进步的社会议程之际，丹麦人却退后一步，从他们狭隘的国家浪漫主义情调中寻求逃避。狭隘至今仍是丹麦人的一个显著特点，[1]只是他们那骤然改变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造成了一种奇特的两重性，可以恰当地描述为“谦卑的骄傲”，许多人常常误认为那是一种装模作样的矜持。”

“丹麦生活的概况：

——丹麦第二大岛菲英岛（Funen）南部风光旖旎，它那连绵起伏的地形宛若一位侧卧的裸女。

——吃过一顿腌鲱鱼、红洋葱裸麦面包的午餐，再喝上一杯乐堡（Tuborg）啤酒和一杯冰凉的杜松子酒之后，那种微醺的感觉美妙极了。

——Flødebolle是一种外面涂了一层巧克力的意式糕点，底座为威化饼干。（有点像Tunnock品牌的茶点饼干。有时候底座是杏仁糖，但是要避免选择这种底座的蛋糕。）”

“——去哥本哈根以北那座古老的巴肯游乐园（Bakken）游玩，就我所知，它是瞬间把你带回到童年时光的最好去处。

——婴儿在咖啡馆外面的婴儿车里睡觉，这种现象在丹麦全国各地司空见惯，而且发生在各种天气条件下。（美国前住房部专员凯瑟琳·奥斯汀·菲茨，曾经提出一个对各国进行排名的概念，叫作“雪糕指数”，它考察一个国家有多少比例的国民，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独自出门，走到最近的店铺买一支雪糕，再安然无恙地走路回家。根据这个指数，丹麦必然会荣登榜首或者名列前茅。）”

“——演员贾斯珀·克里斯滕森（《007：大战皇家赌场》中怀特先生的扮演者），他那张扭曲疲倦的沧桑脸孔似乎镌刻着尘世间无尽的忧伤。

——在哥本哈根运河区的克里斯钦港（Christianshavn），蜀葵从碎石缝里生长出来。”

“丹麦人大致是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或者像丹麦人愿意让你相信的那样，几乎是个无阶层的社会，这一点对它的包容性当然大有助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丹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一直在为缔造这个经济平等、性别平等的社会而努力。一句丹麦名言总结得很精辟——也是一句话，类似于豪斯特的那句“失于外者，得于内”，它出自葛隆维笔下，所有丹麦人烂熟于心：

Og da har i rigdom vi drevet det vidt, når få har for meget og færre for lidt.

（我们将大步推进平等，让这里没有太多富人，穷人更少。）

这听起来好像某种乌托邦的幻梦，可是，大体来说，丹麦人成功地实现了这个梦想。历史学家托尼·霍尔在《斯堪的纳维亚：与巨怪为战》（Scandinavia: At War with Trolls）一书中写道，葛隆维建立民众中学的基础原则是，“只要可能，就要教导人们懂得，无论社会阶层与职业如何，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正如人只有一位母亲、一种命运和一个目标”。其结果就是，根据《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周刊，90%的（丹麦）人口几乎处于一模一样的生活水平。”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作家弗朗西斯·福山等杰出人物，到庄严肃穆的机构如联合国等，他们所表达的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都是，基尼系数直指一切问题的要害，这个要害不仅关乎社会的平等程度，也关乎它的国民的幸福与健康。愿意的话，你可以这样认为，它是人类幸福感的要义所在。”

“瑞士人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称，加强直接民主（例如瑞士人在各州享有的直接民主）是幸福感的关键。站在北欧国家的角度，我有一个假说。有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一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那么，超过这个限度的更高等只会导致幸福感的收益下降？如同对财富的测量所证明的结果，人一旦拥有了足够的平等来满足基本需求，更高的平等不一定能够导向幸福感的相应增加。这能否解释丹麦人何以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虽然他们并不是最平等的？”

“乐于相信别人的倾向是怎么来的呢？高度信任与压倒一切的群体本能难道深深地根植在丹麦人的心灵深处吗？他们的集体主义态度是过去500多年来，领土与实力一再遭到削减和剥夺的苦难历程留下的遗产呢，还是“失于外者得于内”的豪斯特思想，也即把生活狭隘化的体现？又或者是近代形成的——是福利国家、高税收和经济平等的标志性产物？”

“日本人是平等的，却并不彼此信任。”

“高税收挫伤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压制雄心抱负，打击创新；福利国家助长社会底层不负责任的依赖行为，社会民主离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这些人，用历史甚至遗传学来解释北欧奇迹，更合他们的心意。

“你听过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吧？公元800多年，维京人攻打巴黎，”贝扬斯科夫对我说，“一个巴黎人举着白旗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走出来，要求与维京人的国王对话。据说维京人爆发出一阵哄笑，说，‘我们都是国王。’以前，我们不认为信任和平等在那个时期（维京时代）就已经建立。我们认为，信任与福利国家之间存在纽带，信任是可以改变、可以培养的，福利国家促进了信任，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福利国家制度直到1961年才真正开始实行，而在那以前很久，斯堪的纳维亚就存在高度的信任。要想解释（斯堪的纳维亚与其他国家之间）信任水平的差别是怎么来的，就必须至少追溯到19世纪。”

“丹麦社会经济状况出现两极分化，更具代表性的例子，也许是生活在“威士忌带”与“烂香蕉”区域的丹麦人的差距。前者生活在丹麦的“黄金海岸”Strandvejen（海滩路），在那块狭长地段，触目可见豪华的别墅、现代派平房和看得到海景的公寓楼，许多房屋由战后丹麦具有传奇色彩的建筑师设计（前面提到过“世界上最美丽的加油站”，由丹麦建筑设计大师阿纳·雅各布森设计，就位于此地）。海滩路从赫勒乌普欣欣向荣的郊区开始，向北延伸20多英里，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美丽海滩，有米其林星级餐馆，有雅各布森设计的著名的贝拉维斯塔住宅区，有林木森森、郁郁苍苍的鹿之园（Dyrehaven），再往北，还有斯堪的纳维亚最可爱的美术博物馆“路易斯安娜现代艺术博物馆”。

海滩路上的渔村和汉普顿式的海滨豪宅是丹麦精英的家园——丹麦的电影明星和导演、声名显赫的律师、银行家、对冲基金投资人、体育明星、CEO和IT创业家等，纷纷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房价用英国和美国的标准来看微不足道，平均在100万英镑左右，即使涨起来，也不超过300万英镑，但是在丹麦人眼中，海滩路是个象征，既象征着他们在确信没有人旁观时所渴望拥有的一切，也象征着一个原本朴素而平等的社会中那粗俗的、应受谴责的反常现象。

“丹麦的公共服务经常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铁路系统几乎破产，医院效率低下，中小学糟糕得令人发笑——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不禁产生疑问，丹麦人仍然觉得自己交纳的税金得到了很好的回报，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不太清楚那些钱被花到了什么地方。前不久，自由联盟（右翼，经济自由主义政党）的一名议员提出，应该把所有公共支出的明细都列在个人报税表上，这样丹麦人就可以知道自己交的税有多少被用于教育、多少用于国防，等等。在我看来，这谈不上是什么革命性的创想。

“丹麦的公共部门和税收水平无法持续发展。如同西方社会的整体情况，丹麦的人口步入老龄化，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逐年减少，出生率处于20年来的最低点。唯一的问题是，哪位政治家、哪个政党有conjones（魄力）做出那些可能极其不得人心，却实属必要的决策呢？

丹麦人似乎面临着异常艰难的抉择，这些抉择不仅对他们长远的经济稳定，而且对他们那被大肆渲染的幸福感产生直接后果。可是，他们面临抉择吗？在我的童年时期，英国社会到处弥漫着个人主义的、铁娘子一代的、“贪婪是好的”的氛围，也许，这导致我对类似丹麦社会的集体主义的好处视而不见。”

“权利的堡垒》是一部丹麦电视剧，讲述虚构的丹麦女首相比吉特·尼堡的故事，它在复制的克里斯钦堡宫内拍摄。这部电视剧在英国和美国的荧幕上热播一时，当然还有丹麦的荧幕，半数人口每到星期天晚上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它的故事情节诡异地预言了赫勒·托宁·施密特当选丹麦首位女首相。剧中有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先生，他给尼堡出谋划策，教她在少数派的政府中与敌对势力发起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我想，吕克托夫特就像那位老先生在现实中的化身。他坐下来，继续警觉地看着我。

“节诡异地预言了赫勒·托宁·施密特当选丹麦首位女首相。剧中有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先生，他给尼堡出谋划策，教她在少数派的政府中与敌对势力发起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我想，吕克托夫特就像那位老先生在现实中的化身。他坐下来，继续警觉地看着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吕克托夫特一直活跃在丹麦政坛，当代丹麦的大多数重要决策都有他的参与，或者说幕后有他的身影，尤其是税收负担从1960年占GDP的25%增加了两倍，达到今天破纪录的将近50%。”

“他前不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丹麦模式》（The Danish Model），其中突出说明了他自1981年进入议会以后，参与推行的多项经济和劳动政策。这本小册子试图解释丹麦的所谓“大黄蜂”经济：传统的经济学思想认为，这种高税收、庞大公共部门的模式会抑制增长、创新和竞争力。它应该行不通。正如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笨重的、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大黄蜂应该飞不起来。可是，丹麦经济和大黄蜂都实现了腾飞。”

“首要动力是缔造一个具有竞争力、高增长、高就业的社会，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别要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小，而且更加和谐，社会保障更高。”吕克托夫特对我说。他年近七十，如今不再留着一度成为其标志的山羊胡子。一张矮桌摆在我们中间，他呷了一口咖啡，从桌上的盘子里剥了一颗糖吃。“丹麦的分配模式——对钱和准入资格的分配——比美国或者英国向更多人敞开机会的大门，让他们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可以发掘自己的潜力。我们一直在努力向新自由主义的怀疑论者证明，这只大黄蜂能飞起来。”

“丹麦人极力渴望营造一种绝无挑战性的、轻松随意的hyggelig氛围，这种渴望与我的后殖民时代“吊桥理论”相吻合——也就是那种“失于外者得于内……”的心态；帝国崩塌之后，丹麦对所剩无几的文化和经济资本敝帚自珍，它把凝视的目光转向了内部。大家必须抱团取暖，必须认同共同的价值观，不管盛行的风向或者潮流是什么，也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这种需求也许扎根在丹麦失去领土的历史当中。这一小块平坦的土地就像一只救生筏，他们相互偎依，很快就学会了不要故意捣乱、惹是生非。Hygge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方式，它可以避开有争议的话题，或者把不愉快的记忆掩盖起来——“唔，好吧，以前我们有挪威，有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现在，我们把它们都丢了；不过，我们有必要谈论这些历史吗？再来一瓶阿玛罗尼葡萄酒怎么样？英格阿姨：再唱一首歌吧！”

“正如《经济学人》的北欧专刊所述，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极好的出生地……条件是，你必须是个普通人。如果你才能平平，有平凡的追求、寻常的梦想，那么一切都好；如果你卓尔不群，有高远的梦想、宏大的视野，或者多多少少有点与众不同，那么，假如你没有赶快移民，远走他乡，一定会被彻底摧毁。”

冰岛

“第一天，我在邮轮码头货栈间的一家小小的渔棚餐厅Særeifinn（“大海男爵”）吃了午饭，我的左右两侧各坐着一对智利夫妇和一个法国人。我们挤坐在几张公用桌的四周，桌下放着蓝色的塑料包装鱼桶，喝着热气腾腾的大碗Humarsúpa（海螯虾汤——是冰岛最负盛名的一道菜肴）。哈卡尔（Hákarl）是另一种著名的冰岛美食。我很高兴再次品尝Humarsúpa，但是只要我意识尚存，就宁死也不会再吃哈卡尔。这一区域捕获的鲨鱼，如果趁新鲜食用，似乎是有毒的，可是，冰岛人没有彻底放弃吃鲨鱼肉这回事，而是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它埋在地下18个月到4年之久，直到肉质腐烂，达到能够勉强称之为“能吃”的地步。这就是哈卡尔。”

“冰岛与另外几个北欧国家还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它缺乏真正自由的、多样化的出版物。在整个北欧地区，你都不用发愁看不到严肃、独立的宽幅报纸，可是在冰岛，出版物要么为新自由主义者所拥有，要么受到新自由主义者的严重影响，他们有效地压制了一切与之冲突的言论。”

“冰岛人购买商店、银行，创办免费报纸，好像有一种要把哥本哈根变成殖民地的奇怪企图——那些商店都是丹麦的象征，”吉斯利·帕尔森同意我的观点，“当然，丹麦的反应是，‘这是怎么搞的？这样下去经济会崩溃的。’我们回答说，‘丹麦人一向这样对待我们。’双方在打一场文化战，带有后殖民时代的紧张色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双方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

“我刚刚行驶到首都雷克雅未克郊区几英里处，便发现自己恍若置身于严寒的月球表面，满地灰色的火山岩，凹凸不平，长满苔藓。过了一会儿，又仿佛正在穿越苏格兰高地。这就是冰岛：前一分钟你还身处石楠遍野的山间，太阳在茂林间投下或明或暗的光柱，转眼就穿行在戈壁沙漠。转过一道弯，眼前呈现一派柔和秀丽的风光，绿茸茸的草地随着地形连绵起伏，它们随即让位于魔国棱角峥嵘的花岗岩山地，山路尽头赫然挂着一条20层楼高的瀑布。接着，你又瞬间回到月球表面（事实上，冰岛正是当年模拟训练阿波罗号登月的地方）。而天气比地形还要多变。”

“我继续往前开，直到雄伟壮丽、令人震撼的瓦特纳冰川跃入我的眼帘。这是冰岛最大的冰川，占地8300平方公里，深达千米。《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书里告诉我，它的面积是卢森堡的三倍。只有你对卢森堡的面积有个大致的了解，这条信息才真正有用。可惜我不知道卢森堡的面积。远在几英里之外，就能看到它那白雪皑皑的广袤原野，我不由地睁大了眼睛。冰川向四面八方铺开去，像一块撒了霜糖的巨型松饼，白色的冰层顺坡而下，漫向下面的山谷。

“瓦特纳冰川一直流泻到海边，在约库萨隆湾（Jökulsárlón Bay）变得粉碎，化为成千上万块冰块。这些公共汽车大小的冰块晶莹剔透，仿佛从内部发出莹莹的蓝光。它们仪态庄重地漂入大西洋。我凝视着它们，就像凝视着清凉的伏特加冰块从眼前漂过。我脱掉夹克衫久久伫立，一动不动地凝望了一个多小时。站在透彻的蓝天下，天地间仅有的声息是冰块发出的宛若天籁之音的细微响动。”

“到了冰岛最大的瀑布——黄金瀑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变成了世界末日般的疾风骤雨。这里每个小时都有几十亿加仑的水量倾泻而下，真是蔚为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我还去了盖锡尔间歇喷泉朝圣，并且站在传奇的施托克间歇泉旁边，近距离体验了这一世界上最为惊险刺激的自然奇观。”

“站在施托克旁边，我甚至深深相信，间歇喷泉与冰岛人的经济狂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们居然能够在这块火热的、蒸腾的、火山频发的岛屿上生生不息，这个简单的事实给他们壮了胆，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尽可以把一切神秘的、毁灭性的力量加之于他们，无论是猛烈的地热活动、可怕的气候，还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他们都能应对。既然他们有能力在这块飞沙走石、浓烟四起的荒原上求得生存，那么，几乎没有什么外界的挑战能把他们吓倒。”

“冰岛人本质上是带有凯尔特血统的西挪威人，我们对这个判断深信不疑。可是，他们的祖先挪威人近年来对其石油财富的处置相当审慎和克制，而冰岛人在受到来自国际市场轻松赚钱的诱惑时，却没有在财政上表现出相应的严格自制，这是为什么呢？冰岛虽然从根本上是条路德宗的、社会民主的北欧国家，冰岛人会不会仍然迷恋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梦？”

“二战”期间，美国人来了，在雷克雅未克城外的凯夫拉维克建立了军事基地。如同历史学家T. K.德里所述，“战争给冰岛人带来了做梦也想不到的繁荣——高价的鱼类出口，为美国人兴建军用机场的建筑工事，针对美国部队的各种服务等，冰岛为美国人效力的人口一度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2007年美军撤离为止，数以万计的美国空军人员在冰岛像流水一样来来去去。他们对如此之少的人口必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

现为花钱消费和兴建基础设施，也体现为文化和精神风貌。凡是美军建立空军基地的地方莫不如此：菲律宾，格陵兰的图勒，以及日本冲绳（举例说明，受美式饮食的影响，冲绳已经从全世界最健康、最长寿，变成了日本国内肥胖和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冰岛经济崩溃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捕鱼配额，此外，冰岛政府还带领国家走上了另外几条美式自由市场的道路。它把冰岛的所得税降低到北欧地区的最低水平（22.75%），实行全盘私有化——最致命的是银行私有化——奥德森和哈尔德之流成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狂热信徒。这种感情是相互的：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曾经写道：“就好比一个疯子经济学家在冰岛发起了宛若中世纪的社会试验……以检验市场制度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取代政府，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这是早在1979年的事，事后看来，他的话一语成谶。”

“我原本以为，冰岛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缩影。冰岛人的样貌像挪威人，讲古诺尔斯语。冰岛是个平等、民主的现代福利国家，冰岛人教育程度高，他们也穿厚实的针织毛衣，也同样面临销售酒精的困境：国营酒水专卖店里店员，也是不赞成喝酒的老太太，和你在挪威、瑞典和芬兰看到的一样。年轻人抽烟斗的情景每每让我感到安心。然而，现代冰岛人一只脚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土地上，另一只脚却好似伸到了蛮荒的美国西部。在何谓北欧这个问题上，他们形成了与常规完全不同的观念。冰岛人年复一年受到自然界风霜雪雨的锻打，奇特的地形地貌使他们心存畏惧，它的殖民地主人虽然还算仁慈，却依然高高在上，他们不得不臣服其下，后来，他们无意中瞥到了美国客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种种冲击，使冰岛人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物。

“结果是，他们天然的同质化和为数不多且紧密关联的人口，并没有演变成可信赖、负责任、开放、强大的公民社会，注重长远发展，强调个人节制——这些特点正是北欧国家如此成功的要素。相反，他们与生俱来爱好冒险的秉性，加之历史上缺乏新教的节制精神，为这场以腐败、裙带关系和反民主为特点的经济混战创造了理想的土壤。迅捷的沟通纽带有利于果断的决策，本应当培植信任 and 责任感，却也为某些人规避责任、打击异己提供了便利。交易在民主渠道之外作出。人们相互贿赂。反对的声音遭到压制。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

“那么，冰岛的将来又将何去何从呢？这个国家发现自己受到了全世界的惩罚，口袋里的零花钱被全部没收。它没有像样的制造业，海里也没有足够的鱼用来偿还欠款。冰岛人于是把目光转向了自己脚下那隆隆作响的可怕能量。”

“冰岛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是蓝湖——这是一座诡异的、奶蓝色的、使用地热的露天浴池，坐落在一块世外桃源般的火山岩中间。它距离雷克雅未克45分钟的车程。我一向以为，这一大片月光般的水池是自然现象，如同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那些色彩瑰丽的湖泊。蓝湖所属的公司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纠正这种想当然的看法。其实，蓝湖的热水和据说能够治病的硅泥是附近的史瓦特森格尼地热发电厂排出来的，该厂20世纪70年代开始运营（我想，对游客来说，“来吧，在一座工业废弃物形成的水塘里泡个澡吧！”这样的广告丝毫没有诱惑力）。这些废弃物当中富含盐分、藻类，当然最重要的是硅泥，硅泥据说对治疗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有益。如今，硅泥被精心包装，作为高档面膜在蓝湖的商店里出售。”

“我想，要提振冰岛的士气，所需要的绝不仅是几台嗡嗡作响的电脑服务器。“今天，很少有人为冰岛感到自豪。”作家辛德利·弗里森对我说。我返回雷克雅未克以后，在卡菲巴林（Kaffibarinn）咖啡馆见到了他。“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是自作自受。国民认同受到了玷污。”

而在一千英里以外的东部，冰岛人的祖先挪威人即将面临自己的认同危机，而且情况远比金融危机更为严峻，后果也更为深远。”

芬兰

“赫尔辛基像一缕清新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也尤其清新。它的市中心很小——可以在20分钟内走完——但是街道宽敞开阔，没有被商业化污染，这一点让人耳目一新；街道两侧生长着挺拔的椴树；码头小巧玲珑，湾流汇集，渡船停泊，看上去与奥斯陆不无相似之处，不过，由于附近一座东正教堂的洋葱头屋顶和那座白得耀眼、气势雄伟的沙皇教堂，而平添了令人激动的东方风情。”

“已故的耶鲁政治学者塞繆尔·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中指出，芬兰处在世界两大主要文明、基督教与东正教的断层线上，两种文化在这里迎面相撞。在某种意义上，芬兰人永远处于撕裂状态；历史上，他们一面受到瑞典的影响，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大陆息息相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东正教的沙皇、与共产主义制度休戚与共。”

“因此，读者也许会料想芬兰人有点精神分裂，或者在文化上“内心矛盾”，我怀疑实情正是如此。在《芬兰：文化上的独狼》中，理查德·D.刘易斯总结了他看到的芬兰人自相矛盾的秉性：“芬兰人心地善良，却渴望独处。他们工作勤劳，头脑聪明，却常常显得反应迟钝。他们热爱自由，却限制自己的自由，商店早早打烊，限制酒



精摄入，公寓大楼里禁止深夜泡澡，他们还听任自己被沉重的税负压倒。他们崇尚体育运动和健美，可是直至近些年，他们的饮食习惯却使芬兰成了西欧心脏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他们热爱祖国，却很少说它的好话。”

“他们与瑞典人关系复杂，俄国人让他们不安。他们担心全世界把他们视为笨嘴拙舌、不善社交的人。他们有喝酒和暴力的问题。他们发生过可怕的内战。他们与纳粹发生过倒霉的纠葛。1947年的领土割让无疑像瓜分次大陆一样使国家分裂。他们越来越担心诺基亚的破产倒闭将再次导致国家几近破产，就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次，等等。

可以说，一切关于芬兰特性的老生常谈——喝酒、暴力、寡言乃至桑拿——其实都只是他们的禁忌的症状或者副作用。本质上，芬兰人是由他们没有说出口的话定义的。”

瑞典

“这里是马尔默大广场（Stortorget），现在是星期五的傍晚时分。我混迹于数千熙熙攘攘的市民中间。他们手挽着手，摩肩接踵地挤在几张长桌边，不时和着一首用瑞典语演唱的歌曲摇摆身体。那首歌的调子是《我的邦妮漂洋过海》（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桌上堆满了空酒瓶和饮料罐，它们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龙虾狂欢节留下的垃圾。胡吃海塞的狂欢活动正在走向高潮。

瑞典传统的龙虾狂欢节——kräftsvika——是瑞典为数不多的公众狂欢日，人们可以抛开面子，无所顾忌地开怀大笑，肆意发泄原本沉睡的维京精神。这个节日每年八月中旬举办，它是阴沉的冬天来临之前，夏日里最后的欢庆。没必要羞羞答答，所有人都吃喝得斯文扫地。”

“瑞典。它是北欧拼图最中间的那一块——它是焦点，是中心，是破解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政治、社会和内部关系史的钥匙。世界对斯堪的纳维亚的看法是：现代、自由、集体主义——而且，相当乏味（除了龙虾狂欢节）。”

“瑞典都被认为（它自己也认为）是全世界的社会实验室：一群金发的集体主义者，满怀英雄气概，奋勇开辟更好的生活方式，遵循更高、更现代的道德准则，写出动听的四分钟流行歌曲。

我们也对有关他们的免费学校和慈善医院、和谐折中的共识政治、经济平等与性别平等的报道津津乐道。”

“芬兰在瑞典以东，曾为瑞典的属地。与芬兰人一样，瑞典人的寡言也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我们熟悉的“高语境社会”理论：每个瑞典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们的观念、预期和意愿十分相似，这意味着即使沟通非常简单，他们也能与自己近距离接触的对方判断个八九不离十。阿克·道恩还写道：

“瑞典人的同质化几乎无法提供置身好友之间的那种安全感。相反，同质化很容易导致一个人高估自己分析、理解对方行为的能力。这就有可能发出‘错误’的信号：举例说明，一个人身穿昂贵而雅致的衣服，实际上却抱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挪威人类学家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对我说过大意类似的话，我们谈到了挪威人与瑞典人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倾向于在公共生活中避免冲突。他们退后一步，唔，他们想避免争议，避免强烈的分歧，有很多话不便说透。挪威人和瑞典人打交道时，遇到很多文化上的问题。我们总是取笑瑞典人，因为他们太正式，太呆板，从来不说心里话，因为他们想维持一种彬彬有礼的氛围。”

那么很显然，马尔默的龙虾节是个异数。瑞典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里的反乌托邦，人人都知道别人的心思，人们不再有权保留个人想法，被迫压抑情绪、观点或者冲动，以免与盛行的社会思潮格格不入。印度人类学家H.S.迪隆写道：“在讨论中情绪变得激动的人，被认为是焦虑的、神经过敏的人。”因此，道恩认为，“瑞典人似乎没有其他人那么‘感受强烈’。”

“瑞典人倘若不是设法让同胞觉得自己“聪明”，就会努力给对方留下lagom的印象。lagom是瑞典人的又一个座右铭。它的意思是“稳健”、“理性”、“公平”、“讲道理”、“做事符合常识”等。虽然这些涵义与路德宗的教义显然一脉相承，据说这个词的词源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维京人。传说是这样的：维京人围坐在篝火边，共饮装在牛角里的蜂蜜酒，他们体贴周到、彼此关爱、同甘共苦，始终记得自己不要喝太多，然后再把牛角杯传给下一个人（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再出去大肆劫掠，一刀砍下修道士的脑袋）。人们认为，维京人时代的Laget om可以大致翻译成“传递（酒杯）”，日久天长逐渐演变成了lagom。今天，它是指一种心甘情愿的集体克制。

“Lagom定义了瑞典社会多方面的行为，从消费方式到政府体制。瑞典人的消费绝不引人注目（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把背面镶满施华洛世奇透明水晶的iPhone手机和炫彩毛衣外套视为时尚的只是极少部分瑞典人）。他们的政治制度倾向于依赖妥协、调和与共识。Lagom显然与那份虚构的丹麦社会宣言——詹代法则有关。詹代

法则定义瑞典社会的程度不亚于，甚至更甚于丹麦（瑞典人把它叫作Jantelag）。瑞典人比丹麦人还要害怕出人头地，他们更不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更倾向于轻描淡写和谦虚低调。”

“这只是正餐的前奏。我可以写满一本书，向你介绍在肉丸与Jansons frestelse（奶油烤土豆配凤尾鱼——斯堪的纳维亚的伟大发明）期间和之后，你应该怎么做，不过，我的意思想必你已经明白。这里还有一句提醒：祝酒的时候，千万不要与人碰杯。我犯过一次难堪的错误，才学会了这个教训。那一次，善解人意的男女主人狐疑不解地看了我一眼，马上开始紧张地模仿我的举动，热切地希望我不要感到无地自容。虽然多年来，你也许在好莱坞的维京人影片中看到过五花八门的干杯欢庆的场面，并因此受到误导；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与人碰杯却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做法，很不得体。”

“如果你怀疑我的入门指点不够全面（你的怀疑没错，不过，说句实话，要想写出一本面面俱到的指南，我必须在痛苦中耗费一生的时光），你希望深入了解瑞典人冷淡深密的心理，那么，最好的指南莫过于阿克·道恩的著作《瑞典人心理》。道恩曾经担任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北欧博物馆馆长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民族学系主任，他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北欧人种学家。人们称他为研究瑞典国民性的“大师”，他的著作是性格分析的杰作：我从未看到过如此精准——或者说如此残酷地剖析一个民族的著作。”

我在瑞典逗留期间，瑞典人的唐突无礼经常让我觉得心惊肉跳，现在终于有了解释：他们冒失地打断别人说话，旁若无人地挡住别人的去路；许多时候，他们完全不讲基本礼貌，把我气得够呛，却又无可奈何。举例说明，我在市中心火车站等待乘车前往哥本哈根机场时，总是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人是跨过厄勒海峡大桥回家的瑞典乘客。瑞典人不等车上的乘客下完，就争先恐后地挤进车厢，而且理直气壮，好像这样再正常不过。普通人的这种粗野举止，我在丹麦也领教过许多次。可是，瑞典人作为全世界最无礼的人，只有中国香港人可以与之相比。瑞典人的形象原本是相互尊重、秩序井然、胆小怯懦，他们的唐突举止与这个形象南辕北辙，因此更加令人费解。有人曾经对我说，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态度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悖反：我和你一样有权走路、开车、骑自行车，所以，我没必要礼让你。我认为这个解释有点道理——要么如此，要么就是许多时候天气太冷，没工夫客气地周旋。

“我有一种理论——它也许是我的又一条偏于牵强附会的理论，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那就是，lagom和詹代法则背后，其实都有着一个更为奇特的文化输入品：唐老鸭，这个卡通形象在斯堪的纳维亚经久不衰。在丹麦或者瑞典，我每次使用别人家的卫生间，马桶边十有八九会放着一摞被翻过无数遍的唐老鸭连环画；唐老鸭在丹麦叫Anders And，在瑞典叫Kalle Anka。星期五晚上，我打开丹麦电视台的热门频道DR1，黄金时段播出长达一个小时的《迪士尼乐园》（Disney Fun）节目，主要是已经60岁的唐老鸭动画片。更何况我还听说，在瑞典，每年12月24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是1958年的唐老鸭圣诞特辑，这已经成为传统。我琢磨过人们何以迷恋这只倒霉的、不穿裤子的鸭子。唐老鸭的生活态度似乎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截然相反：他贪婪，自私，脾气暴躁，行为鲁莽。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总是为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付出代价，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伤害、侮辱，并无数次眼冒金星。看到喜剧演员拿禁忌开玩笑，观众可以获得一种替代的刺激感；我相信，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谦虚、平和、遵纪守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唐老鸭起到了类似安全阀的功能。他们做梦也不会像唐老鸭那样丢人现眼；比如，三个放肆的外甥吃掉了唐老鸭的蛋糕，或者两只花栗鼠的捣乱让唐老鸭在盛怒之下大喊大叫，捣毁自己的家。但是，看着这些故事以动画片的形式发生发展，他们获得内心的安宁，心灵得到净化。”

“我的第一站是诺贝尔博物馆，它坐落在风景如画、令人陶醉的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老城。老实说，由诺贝尔奖引发的沸沸扬扬的喧嚣让我十分厌烦。众所周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靠发明炸药发了财。炸药最早用于采矿业，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被用来制造军火，杀戮了数万人，此后又夺去了无以计数的生命。可是，诺贝尔退休以后住在意大利的里维埃拉。一天，他闲来无事，想到起草遗嘱，觉得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虽然沾满血迹，却有理由以自己的名义设立一项和平奖——这就好比让企图杀害幼儿耶稣的希律王出资主办婴儿选美比赛，或者让爆破工人来颁发建筑奖。”

“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精挑细选，委实评选出几位真正出类拔萃的人物。举例说明，如克里斯托弗·希金斯指出，亨利·基辛格背叛了伊拉克库尔德人，支持种族隔离，听任“印度支那蓄意大肆杀戮平民”。基辛格获得了1973年和平奖。如果你发现，甘地始终不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阿尔·戈尔倒获得过），那么，奥巴马赢得了2009年和平奖，虽然争议较小，未免有点荒唐。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组成的委员会颁发；其他奖项——文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则由瑞典的委员会颁发。不知道诺贝尔为什么在两国之间这样分配奖项，不过，在他去世之际，挪威受瑞典统治。也许他认为，挪威是两国中较不尚武的那个。”

“极权主义的定义是“一种政府形式，它包括一个权力当局控制一切，不允许存在反对派”。20世纪大半时间，瑞典本质上是个一党国家，该党就是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他们管制着安守本分、默默顺从的公民方方面面的

生活，尽力确保公民遵守他们所规定的现代而进步的社会准则。当然，瑞典不是苏联——通常来说它的财富分配比苏联公平得多，它为公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也高得多。瑞典人虽然没有特拉贝特轿车，却也不曾为买土豆而排队；他们由于共同遵守某座现代的、世俗的“英灵殿”的旨意而获得了回报。这座“英灵殿”就是Folkhemmet（“人民之家”）。它是全世界最慷慨、进步、覆盖广泛的福利国家。“人民之家”保证让每位公民绝不会饿肚子或者无家可归，人们生病时得到照料，年老时领到退休金。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瑞典人实行完全就业，其中一部分人领取的工资为全世界最高；他们有许多全国性的假日，还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这一切没有太多值得反对的。那么，也许，更准确的词语应该叫作“良性极权主义”（benign totalitarianism）。”

“波兰作家罗兰·汉福特早在1971年就用这类词语来描述瑞典了。他在自己的著作《新极权主义》（The New Totalitarians）中描绘了一幅画面：瑞典是个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自由、抱负和人性都为了社民党的理想而被牺牲。“现代的瑞典满足了赫胥黎笔下的新极权主义的全部条件，”他写道，“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着人民，人民乐于受到奴役。”

“20世纪80年代，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也看出了这一层。他在自己的著作《欧洲、欧洲》（Europe, Europe）中写道，瑞典政府“对私人事务的监管达到了其他自由社会前所未见的地步”，政府不仅逐步侵蚀公民权利，而且摧毁他们的精神：“看起来就好像社民党……成功地驯化了人类这种动物，而其他完全不同的政体——从政教合一到布尔什维克，均未能成功，”他写道，“凡是反对社民党的人，都倾向于为自己的立场向它道歉，而且是在不知不觉向它道歉。”

“瑞典社民党与工会（直到不久前，任何人只要加入瑞典较大的工会，就自动成为社民党党员）和一小撮实业家携手，共同设定工资水平，确保瑞典的工业几乎完全不受劳动纠纷的干扰（至少在1980年的几次全国大罢工之前没有纠纷）。劳动大军如此驯服，作为回报，政府实施了全世界最为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管制（直到今天，瑞典公司解雇一个人都极其困难，代价高昂），并提供最为慷慨的失业补助。1975年，政府强制要求工会代表参加企业董事会。与极权主义的标准相吻合，社民党主持司法，垄断经营国家的电视和广播机构，并通过政府广泛资助艺术活动来引导和影响瑞典的文化。“世纪之交，绝大多数主教、将军、总经理、大学教授和大使都是社民党党员，或者社民党的同情人士。”瑞典资深记者乌尔夫·尼尔森在他的著作《瑞典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Sweden?）中写道。”

“七八十年代的社民党首相奥洛夫·帕尔梅。

“在注意到他的外部世界看来，他代表瑞典的一切，它的虔诚、左翼和国际主义，”安德鲁·布朗写道，“在瑞典国内，他是个典范，象征着社民党当权派的傲慢和优越感。他们接过一个贫穷、等级森严的父权社会，把它变成了一个富裕、高度平等的女权国家。”

奥洛夫·帕尔梅出身贵族地主家庭。他去了美国，在那里发现的不平等现象让他触目惊心。20世纪50年代他回到瑞典，加入了社民党。他得到塔格·埃兰德的赏识——埃兰德是瑞典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并于1969年取代埃兰德担任了首相。在帕尔梅治下，瑞典的福利制度在医疗保健、儿童保育、住房、照顾老人以及更多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提高税收以覆盖成本，并对瑞典快速增加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在国际舞台上，帕尔梅以主动出击——有人也许会称之为“说教”而闻名。他巧妙地把瑞典的中立变成了一种立场。”

“瑞典人何以允许一个政党在漫长的时间内享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推行如此激进的政策，并且在其治国施政过程中把国民的一大块收入据为己有？我知道，他们每隔几年选举社民党执政时，都经过了透明的民主程序。可是，当瑞典人目睹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缓慢地遭到侵蚀，当他们感觉到国家伸出长长的触角，在他们的内衣裤里翻找仅余的几块钱、要求充作税款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从来不喊一声“够了！”还是说瑞典人就像那只寓言中的青蛙，它先泡在冷水锅里，对温度的缓慢变化毫无知觉，直至达到沸点才反应过来？”

“瑞典人何以成为良性极权主义如此理想的臣民呢？

有几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因素：据称维京人自古主张平等；路德宗强调集体牺牲、社会正义、平等、自制和否认；封建制度在瑞典较为薄弱；瑞典自16世纪以来一直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工会和协作运动兴起。最重要的是，瑞典的无地农民数量庞大，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富有的地主手中，贫富差距的程度远胜于（比如说）丹麦——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发起集体报复的时机已然成熟，虽然“报复社会”的说法也许会惹恼某些社会主义者。”

“现代性成了当权者挂在瑞典公民前面金灿灿的胡萝卜。先是4次连任的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接着是他的继任塔格·埃兰德（埃兰德担任这一职务共计23年），然后是帕尔梅，他们鼓励瑞典人抛弃旧习，步调一致地向光明迈进。一切事物，只要是现代的，就是好的。像瑞典这样理性的、破除蒙昧的国家，不需要民间传说和搭扣鞋子，不需要繁琐的仪式和社会习俗。工会联盟是现代的。集体主义是现代的。中立是现代的。经济和性别平等是现代的。普选制是现代的。离婚是现代的。福利国家是现代的。最终，多元化和大规模吸收移民也被认为是现代的。每个星期天上午，花一个小时听一名二流的神学院毕业生布道，则不是现代的；牧师身穿过于宽大的长袍，看起来犹如一只幻灯片放映机。民族主义也不是现代的——瑞典国歌绝口不提“瑞典”这个词。”

“依我看，在这个号称进行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社会里，最出众的角色是企业老板扮演的角色。受雇者基金（Wage-earner Funds）其实是让工人最终接管生产手段的一种方式，当年英国《论坛报》（Tribune）称之为“进入竞选宣言的一项极其纯粹的社会主义主张”。即使瑞典提议设立受雇者基金，从而行走在完全社会主义的边缘之时，幕后也有富有而退隐的资本家家族充当后盾。这些家族即使没有亲自掌权，至少也积极地为掌权者出谋划策。瓦伦堡家族是瑞典最显赫的家族，势力广大，根基深厚（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丹麦的马士基运输帝国，对瑞典的GDP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个家族与瑞典政府如此休戚与共，“二战”期间，雅各布·瓦伦堡当时已经与其弟马库斯继承了家族企业，兄弟二人一度代表国家与纳粹进行贸易谈判。后来，瓦伦堡家族作为瑞典政府的业务伙伴，与政府共同发起了雄心勃勃的核计划。鼎盛时刻，该公司雇用了私营部门几乎五分之一的从业人员（约18万名瑞典人）。”

“要想理解瑞典的体制，最好的切入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卢梭的思想。”他接着说。他宽厚地以为我谙熟卢梭的思想。“卢梭主张极端平等主义，他发自内心地讨厌一切依赖——对他人的依赖破坏一个人的完整性、真实性——因此，理想的情况是，每位公民都是一个原子，与其他原子相分离……瑞典体制的逻辑基础是，依赖他人、受人恩惠是危险的。哪怕他们是你的家人。”

“瑞典的“国家个人主义”（statist individualism）——这是他的用词，让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之间绽放最为纯粹的爱情成为可能。妻子不必因为丈夫把他们共同账户的取款密码锁在抽屉里而徘徊不去，丈夫也不必因为妻子的父亲是磨坊的老板而唯唯诺诺。“只有两个人彼此独立、平等，才可能发生真正的爱情和友谊。”他和坦高尔德写道。这么说，社民党比爱神丘比特还要高明。”

“我们没有说人们完全独立，因为他们还必须依赖国家。一种观点就是你的极权主义观点，但是对此我不能苟同。我认为，这是相当公平的交换。公民接受民主国家，作为回报，他获得广泛的自主权；民主国家事实上为他提供了自己做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和手段。我不会把问题推到极致，如果做得太过，确实会变成极权主义国家。”

“詹代法则和lagom（稳健、理性）等社会习俗，人们追求共识和遵守规矩的深刻本能，民主制度，全民免费教育和税收再分配制度，种种因素都保证了他们能够平等地对待彼此，不论籍贯和职业如何。北欧地区为此感到极大的自豪，这无可厚非。丹麦语用øenhojde这个词来表达，它的字面意思是“目光平视”；你认为对方与你人在社交时是平等的，无论他的职业、财富和地位如何。

“在斯堪的纳维亚，看似一切都那么自由、精巧、没有阶层，可是，在民主、中庸、精英化的北欧起居室里，却赫然矗立着一只庞然大物，它头戴王冠，身披天鹅绒长袍，脖子上围着貂皮披肩。这个明晃晃的证据表明，北欧三国依然存在阶层。当然，我指的是那个反民主的荒唐摆设：君主。”

“我从根本上是个共和党人。这无疑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我倾向于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国王是个调味品。瑞典历史上曾经有过人民与国王结盟，反对贵族。这也许是胡说八道。但是人们有这种想法，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来反对贵族。”

“斯堪的纳维亚某些正面特点——信任、社会凝聚力、经济与性别平等、理性主义、谦虚、平衡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等等。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给我们的经济造成了破坏，此刻，西方世界正在寻找一种替代制度，它既要避免苏联的极端社会主义，也要避免美国缺乏监管的新自由主义。”

“北欧的幸福现象中还有一个要素我尚未提到，至少没有明确地提到。专家告诉我们，幸福的一个关键是对生活的自主性——自己主宰命运，完成自我实现。这是一种奢侈。北欧地区长期被认为具有最高水平的福利和生活质量，人们生活最幸福，自我实现程度最高，它同时也是教育机会最平等的地区，这不是巧合。伦敦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比较了父子两代人在30年间的收入情况，它表明北欧是全世界社会流动性最高的社会。北欧四个主要国家占据了榜单上的前四位。”

“要想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幸福，一个首要前提是人必须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确立和掌控自己树立的目标，如果离目标尚有差距，能够作出适当的改变。这不能仅是一种认知，仅是一句像“美国梦”那样的空洞口号（顺带提一句，美国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流动性一项排在靠后的位置）。在斯堪的纳维亚，这是生活的现实。这里是真正的机遇之地。北欧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比美国 and 英国大得多。虽然这里崇尚集体主义，虽然国家对人们的生活多有干预，在北欧，一个人却有极大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Excerpt From

北欧：冰与火之地的寻真之旅【三联·生活书店出品！豆瓣8.6分的北欧民族志，默默加印12次的佛系镇店之作，电子版首次上线！英国旅行作者深度吐槽游北欧】

[英] 迈克尔·布斯

This material may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1人阅读 编辑 | 设置 | 删除

有用 0

没用 0

收藏

转发

回应 转发 收藏



添加回应

☐ 转发到广播

加上去